农业、农村、农民与英国现代化关系初论

孙立田[1]，冯占锋[2]

（1. 天津师范大学 欧洲文明研究院，天津 300387；2. 唐山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英国现代化源于中世纪，农业、农村、农民是其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财产权利与财富积累等角度，探讨了英国封建社会瓦解、资本主义起源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肯定了英国从封建经济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农业的经济基础作用和农民的基本动力作用，极富历史启示价值。同时，英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农村是工业化的策源地，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农民则始终是工业化的推动者；以乡村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第一阶段首先从农村起步，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共生与互动关系；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带动了农业和农村的调整与改造，而且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生活价值也得到了综合体现。

关键词：农业；农村；农民；英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5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6)01－0058－09

DOI：10. 16160/j. cnki. tsxyxb. 2026. 01. 009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Farmers and British Modernization

SUN Litian[1], FENG Zhanfeng[2]

(1. Institute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British modernization originated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as its logical and historic starting point. Classical Marxist writers explored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ssue, such as the disintegration of British feud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ricultural labor productivity, farmers' property rights, and wealth accumulation etc. They affirmed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agriculture and the driving force of farmers in Britain's transition from a feudal economy to capitalism, offering profound historical insights. Modern British history also demonstrates that rural areas are the cradle of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e its foundation, and farmers its perpetual promoters. The firs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marked by rural industry, began in the rual areas. Industrializatio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med a unique symbiotic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lso drove the adjust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he economic

收稿日期：2025－01－29

作者简介：孙立田（1966－），男，天津宁河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国史、历史教育；
冯占锋（1979－），男，河北永年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国史、英汉对比与翻译。

value, ecological value, and life value including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have been comprehensively realized.

Key Words: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farmers; Britain; modernization

1850 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1851 年，英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 50.2%，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至此，英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也实现了城市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原生型现代化国家。那么英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国家？换言之，英国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故乡、现代工业文明的摇篮？这是如何发生的？其现实借鉴意义如何？这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们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

一、农业、农村和农民是英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英国的现代化是从历史中发展而来的，这就需要我们将关注的目光转向近代以前的历史——中世纪西欧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在中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其经济社会形态决定了农民、土地和农业是其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土地是农业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是农业生产、生活的主体。这三个要素天然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西欧经济社会的基本图景，而且三者也是从中世纪到近代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逻辑起点。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希尔顿说得非常明确：“不容置疑，整个中世纪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农民家庭的持有地。”而且进一步指出：“对封建主义结构的分析必须从农业基础开始。在中世纪欧洲任何特定时期里，无论城市化的程度有多大，人口的绝大多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都是从事农业或畜牧业的；就人数来说，主要从事农业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数。所以在我们对结构的分析中，基本的生产单位要在农业中去寻找，或者最好在这种经济的混合经营部分去寻找。……因而我们正是要在农业基础内部去寻求封建生产方式的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它决定封建社会的健全、发展和衰亡。”[2]

（一）农业、农村和农民：英国资本主义的起源

一般认为，研究英国经济社会转型问题的学者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其之后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家都把 18 世纪中叶斯密曾经在《国富论》中系统阐述过的经济贸易、货币经济、劳动分工、城镇兴起等因素普遍引入资本主义的定义中，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视为上述因素的综合发展，而且证明了到 18－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使得西欧在世界上已经取得了绝对重要的地位[3]。如此，斯密就与资本主义问题研究联系在了一起。然而，斯密并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也没有阐述过资本主义问题，他只是指出了 18 世纪的英国是个“商业社会”。

据霍尔顿的研究，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描述整个社会制度大约是在 19 世纪 40 年代[4]。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桑巴特、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相继展开资本主义起源研究①。不过，无论是在构建资本主义研究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方面，还是在结合具体英国国情阐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度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贡献都胜出一筹。正如诺斯所言：“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

① 如：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 1 卷，李季译，商务印书馆 1958 年版；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钢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年版。对于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认识，参见沈汉《资本主义史》第 1 卷，第 16－25 页，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家和意识形态。”[5]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变规律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重要位置，并以英国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6]8；恩格斯也曾说过：“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作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7]402 这种坚持历史的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地将农业、农村、农民纳入了系统分析英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借此阐述了具有重要历史启示意义的观点。

其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接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封建主义的衰退和在封建主义下成长起来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初次登场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7]405 并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段简短且明确的重要叙述，进一步阐明了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6]822 马克思的这段话提出了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两个步骤：第一步为封建经济结构解体；第二步为解放了的要素融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其二，资本主义有其具体的产生时间。“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 15 世纪最后 30 多年和 16 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6]825 其三，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多个基本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之上。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是市场依赖型的，劳动力需要通过市场买卖来获得，人们的基本生存也需要通过市场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需要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即他们可以为工资而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一无所有，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土地和生产工具，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其唯一可能的谋生手段；生产资料集中在资本家手中，他们通过雇佣自由的工资劳动者来组织生产，生产的目的是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取利润，所以，与自由的工资劳动者一样，资本家也完全依赖市场。其四，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在农业上呈现的是一条“地主－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雇工”的英国式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仅涉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农民、土地、农业等一系列要素的关系问题，更涉及资本主义起源于何处等根本性问题，比如：哪类经济部门最先酝酿出新兴经济因素并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稳固支撑？首先诞生出资本主义的是农业还是工商业？资本主义最先发生在农村还是城市？资本主义最先发起人是农民还是城市市民？等等。

（二）农业、农村和农民：英国现代化的驱动力

围绕西欧国家现代化问题，学术界的探讨由来已久，形成了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代表性学说，如“贸易根源说”“人口根源说”“阶级斗争推动说”“世界体系论”和“产权革命说”等。以上不同学说，除“贸易根源说”坚持外因主导论并把远距离贸易视为促进新的生产体系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外，其他诸说虽视角不同，但却存在一个共同点，即均认为内因是主导因素。然而，这些学说都强调应当从封建社会内部要素的发展来探寻西方向现代化转变的驱动力。

在国内史学界关于英国现代化起源问题的探讨中，侯建新教授的专著《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颇具代表性，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现代化在英国农村发生过程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从农民入手探讨英国和西欧由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的力作。作者通过对比，系统研究了封建社会晚期英国和中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并以农民作为考察对象，从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者个体力量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深入探索了英国现代化问题，由此提出了两个主要论点：“农业是近代经济基础”；“基本动力来自农民个人力

量的壮大”[8]。

《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及其他相关研究表明，中世纪的英国农民并非生活在田园诗般的社会里，他们是受封建领主剥削的，但他们的境况也绝非像传统教科书中说得那样黑暗，他们不是任由封建领主摆布的。相反，他们争取到了自己的人身和财产权利，也在积聚和发展着自己的力量。英国农民孕育了变革中世纪经济社会的力量，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推动者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相关论述及其启示

农民与经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能轻松解释的话题。从传统认识上来说，一方面农民承载着诸多的美德——宽厚、勤劳、节俭、坚忍，另一方面又背负着诸多难以摆脱的包袱——愚昧、落后、目光短浅，因此，农民只能被现代化进程的浪潮裹挟着前进，永远扮演悲剧角色，最终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而且，农业经济尤其代表了落后的生产方式，因而也必须成为或被改造或被消灭的对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英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发展基础，农民主动参与了现代化进程，两者在推动英国整体现代化的同时自身也完成了现代化转型。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点是资本主义的起源及其发展问题，出于坚持历史的研究方法，自然而然地将农业、农村、农民作为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相关论述相应地构成了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仔细推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我们完全可以得到一些宝贵的历史启示。

（一）农民的土地与农业劳动生产率

马克思关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里面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述了圈地运动的形式与手段，重点强调了其中的暴力因素，并强调有关圈地运动的立法是“十五世纪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6]802。此外，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曾经说过：“自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9]如此一来，英国式道路通常被理解为是以圈地为主要形式、以暴力手段剥夺农民土地为主要特征的模式，被归为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暴力起源论”。按照这样的理解，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

不过，如果将以上结论作为马克思关于圈地运动以及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认识的全部内容则失之偏颇，若将“暴力起源论”直接归于马克思的观点则实为不妥，因为这种认识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首先，马克思关于圈地运动的研究是有前提条件的，他明确强调说，“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6]830，充分说明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农业革命中的经济原因，而暴力手段也并非农业革命的唯一手段。其次，马克思注意到，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土地被剥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在 17 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的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大约在 1750 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 18 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6]830。这说明，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以短期暴力消灭农民阶级为前提，而是通过长期渐进的过程对其进行瓦解的。

马克思非常重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例如，马克思在谈及重农学派关于农业在西欧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的观点时明确肯定：“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10]888可

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社会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基础性前提，没有满足自身需求之外的农业剩余，就无从支撑非农产业和现代社会的发展。

（二）农民的财产权利与财富积累

马克思认为，农业的发展取决于农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积累。他说道："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0]912 由此，中世纪至近代早期农民的财产权利、财富积累状况就成了讨论现代化进程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农民对土地和其他财产的权利，为他们的财富积累提供了保障。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注意到，在中世纪农奴制条件下，农民会受到习惯法的保护，因此在封建组织形式下，不仅隐含着农民所有制的可能性，而且存在着个人财富积累的空间。例如，在分析农民劳役义务问题上，马克思认为，领主对农民的剥削受到习惯法的限制，劳役剥削量的多少是由习惯法规定下来的，一般是固定的、是一个"不变量"，而"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因此"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10]897。所以，在西欧，即使在劳役地租的条件下，"负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进一步解释说，在封建社会里，农民与领主分配产品都是根据传统与习惯进行的，因此领主往往不能额外地去索取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利用劳动时间获得的果实[10]896－897。恩格斯指出："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嚣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恩格斯接着指出，在 15 世纪，"诚然，农业仍旧是广大居民的营生，因而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少数分散的在某些地方顶着贵族的侵夺而保存下来的自由农民却充分证明，在农业中重要的并不是贵族的寄生和压榨，而是农民的劳动"[11]。因此可以设想，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农民将试图巩固他们获得劳动产品的权利，试图巩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利。这种利益进一步加强了"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这一发展模式，也加强了农民对私有财产的支配，这正是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的基础，为后续生产关系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随着货币地租的发展，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人身关系代之以纯粹的货币经济关系。马克思分析了货币地租在促进农民分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中的作用，并指出，"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时，不仅与此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形成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10]902－903；而"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10]903。至此，封建生产关系消亡了。这说明货币地租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社会阶级的分化，为生产关系的近代化转型扫清了人身束缚的障碍，并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三、农业、农村、农民与英国工业化同步、同向而行

英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英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与其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从"挑战－应战"或"冲击－回应"的角度来阐释。换言之，英国的工业化不是以消灭三者为代价而取得的。如前所述，英国的现代化不仅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均是三者，而且它们之间还保持着同步、同向而行。以乡村工业为标志的工业化首先起源于农村，农村成为英国工业化的发源地，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英国工业化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农民则始终是工业化的推动者。当然，随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农业和农村进行了不断的调整与改造，农民自身也实现了向现代角色的转换。

（一）乡村工业化时期：城镇要素的聚集

16－18 世纪，以家庭手工业的蓬勃兴起为显著特征的英国农村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乡村工业化。乡村工业化又被称为“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是工业革命前乡村地区的工业形态，标志着英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首次重大转型。

该时期，英国乡村工业化的形成主要归因于三个关键条件：首先，农业生产效率的稳步提升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工业化进程加速了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转移；最后，乡村地区具备发展工业的天然优势，包括充裕的劳动力储备、便利的原材料获取渠道以及丰富的水力资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乡村工业区与后来形成的全国性工业中心在地理分布上呈现高度重合性，反映出乡村工业化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工业地理格局的基础。

英国乡村工业化最直接的效应之一，就是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工资劳动成为劳动力转移的最早途径。在英国乡村工业区，“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6]858，是亦工亦农的工资劳动者。以毛纺织业为例，根据 17 世纪初时的估算，整个英格兰从事该行业的人口约在百万以上。考虑到当时英格兰城镇人口达不到此数之半，况且其中最多不超过 1/5 的人口从事毛纺织业，因此全英格兰的毛纺织业从业人口中当有 90％以上是乡村人口[12]。伴随着乡村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农业从业人口持续下降。个案显示，在某些村庄这样的变化非常明显。比如，在威尔特郡的科斯利村（Corsley），其乡村工业的兴起是在 17 世纪后半叶，当时主要有宽幅呢和呢绒的生产，从梳剪羊毛到制成呢绒成品所有生产都在这个村庄中进行。其生产组织形式是典型的“家内制”，由几个资本主义呢绒商控制，村民亦农亦工。进入 18 世纪后，当地的呢绒工业迅速扩张，建立了呢绒纺织厂、染整厂和丝织厂，村民亦农亦工的二元并存模式发生改变，工业职业愈加突出。直到 19 世纪中叶，由于受到西赖丁纺织业竞争的影响，科斯利村的乡村工业才衰落下来，工厂全部关闭。时至 1909 年，农业、面向市场的园艺业和当地手工业成为该村村民主要从事的行业，此外，还包括手套编织和运输业等[13]。

乡村工业化改变了英国乡村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结构。截止到工业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工业革命开始的前夕，虽然英国大多数人仍生活在乡村，但他们的劳动却不再仅限于农业了。有英国人作过统计，1739 年，在不列颠诸岛上有 420 万人口从事制造业，几乎占全部人口的一半，而且其中 150 万人口从事羊毛的加工工作，人数最少的行业是棉布衣服制造业，但从事该行业的也有 10 万人。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在“原工业化”时期非农业行业占据着重要地位[14]。据估计，就英国全国而言，1520 年乡村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76％，到 1600 年约占 70％，1700 年约占 55％，1750 年约占 46％；乡村非农业人口比例相应持续上升，1520 年约占乡村总人口的 20％，1600 年约占 24％，1700 年约占 34％，1750 年上升到约占 42％[15]。

伴随乡村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乡村工业发达的区域兴起了一批工业城镇（如利兹、伯明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等），它们呈现出明显的二元性：既保留了传统乡村地区的部分特质，又初步具备了工业化地区的特点。18 世纪初，这样的乡村小城镇在英格兰保持在 700 个左右[16]103。

英格兰兴起的小城镇与乡村工业形成了天然的共生关系。这类城镇在区域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既作为本地农业和工业产品的集散中心，又承担着服务周边乡村地区的功能。如萨默塞特郡东部的布鲁顿和温坎顿两个小城镇，周边乡村生产的毛纺品不仅从这里输往全国市场，而且外地粮食也会运到这里以满足周边从事毛纺织业的乡村人的需求。从空间布局来看，英格兰小城镇的地理布局颇为合理，农民前往小城镇的距离大致在 7 英里范围内，确保了当日往返的可行性。

这种城乡互动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使得农民家庭融入到地区的商业网络中，推动了农业生产从维持生计型向市场化、专业化

转型;其次,乡村与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不仅有效吸纳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更重塑了整个农村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些都为 18 世纪中后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准备和市场条件。

（二）工业革命时期:农业快速发展

作为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阶段,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不仅实现了制造业的突破性发展,更呈现出工农业协同发展的独特模式。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具有双重特征,工业在完成从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生产转变的同时,农业生产力也保持了持续增长,英国形成了工农业双轨并进的良好发展态势。

一是耕地面积持续扩大。在英格兰,1750 年可耕种的土地总面积为 1 051 万英亩,1801 年增长至 1 135 万英亩,1836 年增长至 1 387 万英亩[17]74。同时,休耕地和各类荒地面积不断减少,也体现了农业的发展。17 世纪末欧石楠丛生的荒原、高沼地、山地和贫瘠的土地占英格兰和威尔士土地面积的 1/4 左右,而到 1873 年,却只有 6%～7%的土地是荒地[18]92;17 世纪 90 年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休耕地占全部耕地的 20%,到 1800 年占比有所下降,随后下降得更快,19 世纪 30 年代占比为 12%,到 1871 年仅为 4%[18]99。

二是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不断提高。比如,1801 年、1836 年和 1871 年英国的主产作物小麦、大麦、燕麦亩产量不断提高,每英亩小麦产量分别为 22 蒲式耳、21 蒲式耳和 28 蒲式耳;每英亩大麦产量分别为 29 蒲式耳、30 蒲式耳和 34 蒲式耳;每英亩燕麦产量为 32 蒲式耳、33 蒲式耳和 43 蒲式耳[18]77。粮食总产量也保持了持续增长。1750 年,英国粮食总产量为 1 500万夸特;1800 年达到 1 900 万夸特;1820 年增加到 2 000 万夸特[19]50。在非农业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粮食还可以出口。如 1700 年,英国出口的谷物和面粉有 4.9 万夸特,到 1750 年上升到 95 万夸特。直到 1785 年,粮食的生产才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进口粮食的比例开始逐年攀升。但截止到 19 世纪 30 年代,来自国外的粮食在英国市场的份额非常有限。据统计,自 1820 年以后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进口粮食在国内总需求中只占不到 5%,而且 1820 年到 1824 年、1833 年到 1836 年这两个时间段是英国粮食价格较低的时期[19]80。

三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1650 年一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概可以供养 1.5 个非农业人口,1750 年为 2.19 个,1800 年为 2.5 个,到 1860 年为 6 个。而且,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粮食人均产量比爱尔兰、荷兰、德国、比利时、法国高出 40%～50%[16]170,成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

四是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上升。1801 年,英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 35%,从占比上看较 30 年前的 45%的确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从事农业的整个人口数量实际上却是一直上升的。1831 年英国从事农业的家庭数量为 76.134 8 万户,而在 20 年前则为 69.353万户,净增 6.781 8 万户。这说明在人口快速增长的背景下,虽然农业劳动力和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比在下降,但从事农业的绝对人口数却呈现出与此相反的趋势,只是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英国从事农业的人口数量和乡村人口数量才真正下降[19]38。这很好地证明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农业发展的良好势头。

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伴而行的运河、铁路体系建设进一步吸纳了乡村人口,对乡村变革产生了极大影响。1745 年英国开通了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运河,到 1830 年运河总长达到 7 510 英里。随着运河的开凿与通行,一些新的城镇建立起来;运河也创造了就业机会,1851 年运河解决了大约 37 000 名男性和 2 500 名女性的就业问题[20]。1825 年从斯托克顿到达灵顿的铁路建成通车,这标志着铁路时代的到来。到 1855 年,英国已经铺设了 8 000 多英里的铁路。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一个完善的铁路交通网络已经形成。铁路所及之处,乡村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比如,1837 年的特丁顿还是一个"幽静的村庄,那里有小树林,有庄园,有在泰晤士河边傍水而立的小教堂,还有大片空旷的草地",而到 1884 年则是另一番景象:

“一排排漂亮的别墅和整齐划一的房屋平地而起,一些大旅馆和豪华商店也同时涌现出来”[21]。铁路也解决了大量乡村人口的就业问题。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从事铁路行业的人口达到 100 万,而其中不少于 1/4 的人口来自乡村;到 1914 年,乡村人口中从事铁路行业的有 60 万[22]3。

总之,1851 年工业革命完成前后,农业仍是英国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从事农业的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占比超过了 20%,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也超过了 20%[22]19。

(三)19 世纪中后期:农业相对萧条

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对经济结构的重塑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英国农业显著萎缩。特别是在 1875-1884 年和 1891-1899 年这两个时期,农业生产遭遇了严重危机,直接导致大量农业从业者转向城市或工业部门寻求就业机会,农业从业人口大幅下降。资料显示,1846 年英国农业工人将近 150 万人[22]18,1881 年下降到 983 919 人,1891 年时则又下降到 866 543 人,1901 年更是下降到 689 292 人[23]。到 19 世纪末,英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还不足 10%,而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则下降到 6.7%[22]19。当时存在一种普遍担忧,英国乡村地区的人口持续外流趋势将难以逆转,这种人口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可能会给农业生产体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1846 年《谷物法》的废除被视为英国农业发展的转折点。在自由贸易政策全面实施的背景下,英国国内农产品市场逐步向国际市场开放,导致本土农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之后这一政策的影响持续显现,成为导致 19 世纪后期农业萧条的重要因素。尽管 19 世纪英国人口持续增长,粮食与食品的市场需求在持续扩大,但面对来自国外的农牧产品的竞争,英国自身农牧产品的市场却趋于萎缩。例如,在《谷物法》废除之前,英国每年进口小麦略少于 50 万吨,占小麦消费总量的 7%~8%;该法废除后,小麦年进口量开始超过 50 万吨,占到了 20%;到 19 世纪 50 年代时,小麦年进口量超过 80 万吨,占比上升到 25%[24]245-246。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进口谷物每年达到 150 万吨;19 世纪 70 年代,每年在 200 万~250 万吨之间;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上升到接近 300 万吨[24]248。英国谷物生产自给率 1850 年时为 90%左右,到 1875 年时下降到 75%[18]194。

(四)19 世纪中期至今:乡村现代化转型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英国乡村面临再次转型。作为基础性产业,农业不仅承担着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功能,更在生态维护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乡村转型不是简单意义上传统农业和乡村的恢复或重振,而是需要走出一条新的改造与发展之路,实现现代化转型,以综合体现农业和农村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

一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畜牧业的比重,同时发展兼具商品化和生态环境功能的“替代农业”(alternative agriculture),实现农业经济的振兴。由于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英国一直以来就有农牧混合经营的耕作方式,随着 19 世纪中期农业从业人口数的下降,畜牧业开始成为发展的重点。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就开始调整畜牧业在农业中的占比。畜牧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在 19 世纪初占 51.5%,19 世纪 50 年代占 55.2%,19 世纪 60 年代占 60%,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相对于畜牧业的增长,种植业则呈下降趋势。种植业产出的市场价格份额在 19 世纪初占 48.5%,19 世纪 50 年代占 44.8%,19 世纪 60 年代占 40%[17]116-117。在扩大畜牧业的同时,英国开始发展“替代农业”,即种植具有商业价值的非粮食作物,如瓜果、园艺作物以及作为工业原料的亚麻、大麻、菘蓝和茜草等。发展“替代农业”既可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高农业的商品化,同时又能对生态环境起到明显的保护作用。从 19 世纪末“替代农业”在英国开始盛行起来。

二是开展乡村保护运动,留住“乡愁”。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逐渐萎缩,人

们开始反思其价值。19 世纪及以后，英国陆续成立了多个乡村保护组织，如 1895 年的全国托管协会(National Trust)和 1926 年的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CPRE)等，这些组织推动了乡村保护运动的兴起。其中，英国乡村保护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多项乡村保护法规的出台。该组织对乡村进行保护采取的是一种平衡现实与怀旧的务实路线，不同于试图原封不动将乡村保存下来的浪漫主义者的做法，它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化不可阻挡，故其核心诉求仅在于遏制城镇的无序扩张。这种将传统保护与合理发展相结合的策略，最终成功保存了英国大量的传统乡村景观，从而也保留了可为人们提供精神归属的乡村历史记忆。自此，英国凭借乡村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可见，乡村的发展方向并非恢复农业人口规模或复刻历史辉煌，而是兼顾现代生活品质与自然生态之美，注重对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四、结语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东方杂志》就刊登了《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这样一篇文章，其中写到，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谜”，“把这个谜猜透了，中国的将来，也就决定一大半了”[25]。可见，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寻求解决方案由来已久。根据 2024 年的统计，我国人口达到 14.8 亿，其中乡村常住人口 4.64 亿(占 33%)，虽然城镇人口占了绝大多数，但从绝对数量上说，我国仍然是农民大国；而且农业要承担为 14.8 亿人口提供基本粮食保障的重任，这决定了我国仍然是农业大国。这就是我国的现实国情。另外，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正高歌猛进，农业要向工业转化，农村要向城市转化，农民要向非农职业者和城市市民转化，因此，“三农”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农业、农村、农民与英国现代化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我国综合实现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生活价值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5.

[2] 希尔顿(HILTON R H). 封建主义的危机[J]. 孙秉莹，译，刘崇德，校. 世界历史译丛，1980(5)：4 - 13.

[3] WHITTLE J. 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 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 1400－1580[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7.

[4] HOLTON R J. 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5：12.

[5] 道格拉斯·C·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罗华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8.

[6]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 侯建新. 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人力量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23 - 30.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2 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63.

[10]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29.

[12] 刘景华. 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49.

[13] DENNIS R. Mills, lord and peasa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M]. London: Routledge，2016：57.

[14] 帕尔默，科尔顿. 近现代世界史：上[M]. 孙福生，陈敦全，周颖如，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12.

[15] 汪立华. 英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M].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2：215 - 220.

[16] 杨杰. 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下转第 108 页)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3.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5.
[3] 刘帅.教育家精神的内涵、特征、价值及践行路径[J].教育评论,2024(1):17-23.
[4] 习近平.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J].求是,2021(17):4-20.
[5]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1).
[6] 李劲松,董亚.基于"教育家精神"标准的高校教育家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J].学术探索,2024(9):144-149.

(责任编校:冯兆娜)

(上接第 66 页)

[17] BROADBERRY S, CAMPBELL B M S, ALEXANDER K, et al.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270 — 187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
[18] OVERTON M.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9] HORN P. The rural world 1780—1850[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80.
[20] CANNON J. A dictionary of British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116.
[21]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陈叔平,陈小惠,刘幼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73-274.
[22] MINGAY G E. Rur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M]. Stroud: Alan Sutton, 1990.
[23] EVERSLEY G S-L. Report on the decline in the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R]. London: Darling & Son, Ltd. ,1906:115.
[24] TURNER M E. Agriculture rent in England 1690—1914[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25] 农民问题与中国之将来[J].东方杂志,1927,24(16):2-4.

(责任编校:李秀荣)

(上接第 71 页)

参考文献:

[1] 李述.开平区志[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5.
[2] 王知之.唐山事:第 1 辑[M].唐山:唐山工商日报社,1948:10.
[3]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4]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3 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5] 熊性美,阎光华.开滦煤矿矿权史料[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6] 张雨良.开滦历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1 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9.
[7] 徐冀.开滦煤矿志:第 2 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628.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

(责任编校:李秀荣)